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风险与纾解理路

杨芙蓉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助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选择, 是构建数字育人新形态的实践要求。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探索过程中面临着“算法黑箱”“信息茧房”“智能依赖”“媒介焦虑”带来的隐私边界模糊化、教育资源同质化、情感交流淡薄化、教育对象矛盾化等方面的风险挑战, 应在强化责任自觉、破解技术壁垒、聚焦情感向度、坚持理念驱动等方面系统谋划、持续发力, 促进技术势能的充分释放, 以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转型; 潜在风险; 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 D64; G41

文献标识码: A

Potential Risk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Ways to Alleviate

YANG Furo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atural choice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gital era,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elp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 is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to build a new form of digital parenting.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aces potential risks in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in terms of the blurring of privacy boundaries, homogen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nning of emotional exchanges, and contradic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information cocoon, intelligent dependence, and media anxiet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lf-awareness, crack the technical barriers, focus on emotional orientation,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driving systematic planning, sustained efforts to promote the full release of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digital empower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risk; digital technology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水平”^[1]。当前,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延展了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发展新动能、开辟了发展新领域,数字生产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生产函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厘清其内涵要义、探寻其潜在风险及纾解理路势在必行。

收稿日期: 2024-05-12

作者简介: 杨芙蓉,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

1 应然之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客观必然性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思想引领、价值培塑、行为匡正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铸魂育人的作用，需要不断优化育人模式，创造育人新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其创新发展的内在诉求，契合数字化时代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价值支撑。

1.1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

当前，数字技术逐渐嵌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在以其便捷性、高效性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数字化转型时代已经悄然而至。为了更好地建设数字中国和教育强国，如何实现技术运用与育人提质增效的融合发展成了重要的时代课题。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以技术驱动为教育赋权增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智能化水平，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以一种重构性姿态走向数字化转型。需要明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数字技术的简单移植和叠加，而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过程等全方位的优化。基于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的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在数字技术的融合驱动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覆盖思想政治教育全维度、全过程、全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赋权增能，达到以数育人的效果，实现对受教育者认知转变、能力提升、价值塑造的育人目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变革，创造高效智能科学的育人新形态。

1.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契合数字化时代的现实需要，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普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探索构建新的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整合教育要素，“将冗杂的信息与教育资源融合在一个层次分明的数字化系统内”^[3]，提高教育内容的有序性、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评价模式，数字化评价更加便捷、更加高效，能够提升教育评价的智能化水平。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是把握教育对象的现实需求，数字技术以数据为核心，能够精准研判教育

对象的思想行为变化轨迹，提高育人的精准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把握育人规律，助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诉求。数字技术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逻辑、算法规则实现教育场域的数字化全覆盖。利用数字技术的空间延展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场域，实现学校、网络与社会三大课堂的互动联通，实现现实空间与虚拟时空的高效连接，拓宽立德树人的空间范围。数字技术能够借助沉浸式技术、数据平台实现教育内容的数字化全媒介。通过AI技术、VR技术塑造仿真课堂、智慧教室，能够使内容呈现更加具象、更加真实，让教育内容“活起来”；通过实现教育内容的数字化、图像化，将教育内容以图形、视频、录播课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能够实现教育内容的个性化、差异化供给，助力精准化教育的实现。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价值支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力量，发挥着凝聚思想共识、涵养道德品质、强化价值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培育建设主体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技术发展要求，完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的实践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风险挑战，数字化社会对人们素质的要求提高，人们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强。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凝聚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共识，需要推进思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思政教育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需要培育数字化变革中的现代化建设主体，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支撑。

2 实然之境：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潜在风险

2.1 数据伦理风险：“算法黑箱”的技术风险使隐私边界模糊化

数字技术赋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数字技术凭借其智能化、精确性、通用性等优势，对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尤其表现在数据安全方面。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素是数据和算法，而数据本身就会因人的主观意愿而具有“欺骗性”^[4]，如果

运行不当极易导致数据伦理风险,造成隐私泄露危机以及价值认同危机。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不到位,未形成合理配置、协作联通的系统链条,信息安全保护责任归置不明,易造成数据泄露风险。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借助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支持与保障,但当前数字技术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数据所有权归属问题、责任划分问题尚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数据挖掘和分享的同时,个人数据极易被二次利用,倘若发生隐私侵害行为,或将引发责任主体追溯难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背后的算法运行具有隐蔽性,平台将用户的个人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并使用,导致隐私边界模糊化,存在个人隐私滥用、情感认同淡化的风险。尽管算法逻辑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水平,但算法运行背后的价值取向仍无法摆脱人的影响,在利益驱使下,人的复杂性易导致算法设计与开发中掺杂个人私欲,无论算法多么完善,都很难将主流价值准确表达出来,致使价值认同危机出现。

2.2 视野狭窄风险:“信息茧房”的技术局限使教育资源同质化

数字技术将包罗万象的教育内容通过算法记录、代码设置、数据运算进行线性化信息处理,信息传播平台进行个性化信息推送,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单向性、同质化的加工过程容易引发“信息茧房”问题,使教育资源同质化,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视野狭窄风险,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信息茧房”具有信息窄化、信息割据和信息迎合的特征。首先,信息窄化即算法过滤机制根据用户偏好智能推荐同类信息,受众处于固定的信息圈之中,在裂变式增长的信息浪潮中接收同质化信息,造成“信息孤岛”。其次,信息割据即信息传播受制于固有圈群,不同圈群间缺少沟通交流,用户只愿意接收与自己价值观相符、自己熟知的信息,使得信息传播受阻,教育实效性降低。最后,信息迎合即信息传播平台借助智能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搜索记录、浏览记录、点赞收藏记录等数据,精准化定向推送相关信息,迎合用户偏好,用户视野受限,容易被错误信息蒙蔽。

2.3 情感疏离风险:“智能仰赖”的技术崇拜使情感交流淡薄化

技术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存在过

度入侵的风险。技术通过算法运行把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限制在刻板的规则之下,他们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逐渐沦为技术的附庸,出现“智能仰赖”现象。同时,在技术的过度应用下,主体间的情感交流弱化甚至缺失,出现单向度情感交流的异化现象,教育者的“缺场”容易引发情感疏离危机。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过度应用催生“数字技术至上”理念的产生,“‘数字技术至上’论带来‘数字崇拜’的风险,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工具主义陷阱”^[5]。“数字技术至上”论者对数据的热衷、崇拜导致他们产生工具依赖,过度仰赖智能化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定位趋于模糊化,主导性弱化。长期处于技术笼罩下的教育对象也面临主体性弱化的风险,个性化算法推荐使得教育对象接受的教育内容同质化,教育对象受困于“算法牢笼”,难以实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借助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使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交流能够突破时空的局限,但由于时空的相对分离,二者之间的互动具有间断性和分散性,并且由于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交流效果大打折扣,“积极的情感体验在符号化的数字交互环境中无法得到有效引发,二者的情感交互也难以实现共振”^[6]。更甚者,技术的过度应用促使人-机单向交流凌驾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双向交流之上,这种缺少情感互动的教育同样不利于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

2.4 意识薄弱风险:“媒介焦虑”的技术牢笼使教育对象矛盾化

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泄露风险、茧房围困危机、人文关怀不足,容易导致对智能媒介的担忧和抵触,由此形成矛盾化的心理,难以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共识,导致“媒介焦虑”的产生与传播,不仅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而且会影响数字化作用对象使用智能媒介的态度。一方面,囿于智能媒介存在的技术局限与风险引致的“媒介焦虑”,容易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局限。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过程中,在技术层面和主体层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潜在风险,隐私泄露、资源同质、情感淡薄等现实危机直接影响到数字化的社会可信度。在一个伦理失序、视野狭窄、情感疏离的虚拟场域,“算法记录”“信息茧房”使得人们对数字化转型产生认知偏差,陷入既要发展又不能完全数字化的思想漩涡。另

一方面,“媒介焦虑”的持续发展会降低人们对智能媒介的使用热情,难以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共识。人们在使用智能媒介时被动服从人脸识别、信息采集、手机绑定等硬性规定,埋下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如果数据管理不当或发生病毒袭击,个人信息、数据、隐私有可能发生泄露。这使得人们为了使用智能媒介,需要面对必须服从而内心担忧甚至抗拒的矛盾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3 必然之措: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的纾解理路

3.1 强化责任自觉:构建数字技术责任伦理规制,注重信息安全保护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实现数字化转型,必须发挥以“数据-算法”为驱动的数字技术的助力作用。当前,数字技术凭借精准化、便捷性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加速融合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其中数据伦理风险逐渐凸显。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数字技术责任伦理规制,提高大数据利益相关者的数据隐私素养,同时进行数字技术的优化升级,完善隐私保护条例和技术使用说明。其一,可以借助相关规约制度,规范大数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提高数据使用者的责任自觉,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构建大数据风险监管机制,界定相关主体在数字技术运用中的职责与义务,明晰大数据平台、数据使用者、教育者等主体在数据采集、管理、使用过程中的边界与限度,提高相关主体的信息监管能力,减少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机率;优化培养制度和行为归责制度,借助相关技能培训提高数据管理者的数据安全意识和规范化管理能力,明确相关主体在发生信息泄露事件时需承担的责任,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有效防范隐私泄露风险和数据被盗风险。其二,对数字技术进行优化升级,完善数字技术操作的使用说明,提高数字技术的信息安全保护能力。要完善数字技术的信息分类识别功能、信息安全存储功能、信息精准使用功能,以更加完善的技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主体的信息安全;要将数字技术的操作使用流程、信息隐私条例公开化、透明化,让用户在知晓数字技术可能存在风险的前提下,自行决定是否继

续使用数字技术,并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高端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帮助用户提高数据安全意识,减少个人信息的滥用现象。

3.2 破解技术壁垒:优化数字技术算法推荐场域,推动全域信息传播

数字技术在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使用主体的主观性、海量信息的庞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催生了“信息茧房”现象,教育资源逐渐向同质化方向发展,教育对象的视野受限,难以实现全面发展。算法推荐虽然实现了信息与人之间的精准化匹配,但同时也“造成人的兴趣点固化、视线窄化、思想极化”^[7],一旦算法被掺杂蕴含不良价值的劣质信息,则会给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带来负面影响。对于算法推荐带来的困局,可以从技术本身和主体意识两方面进行破局。其一,要优化数字技术算法推荐场域,制定算法运行必须遵守的原则,重塑算法的权力边界。算法推荐应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利用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和偏好分析必须经由用户同意,避免技术凌驾人的意志之上。为了减少由于技术误差对信息辨别不清的风险,可以将算法审查与人工核验相结合,防止算法成为错误价值观传播的载体。同时可以引入反向算法推荐模型,扩大算法囊括的信息种类,帮助用户接收到更加完整的信息资源。其二,要提高相关主体的自律意识,在信息获取、信息推荐、信息接收的同时,主动选择与主流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内容,培育积极的价值生态。研发人员在编制算法代码时要发挥人文素养,防止“信息欺骗”,要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过滤,精准识别错误虚假信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平台应根据社会的价值需求加大优质信息的供给,助力主流价值观传播;用户在接受信息时,要明确“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害,以价值理性超越工具理性。

3.3 聚焦情感向度:提升数字化教育的情感温度,强化情感互动交流

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容易导致教育对象对数字技术产生依赖,使得技术凌驾于人之上,在教育过程中一味关注技术带来的智能化发展,忽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情感体验,使二者的情感互动交流减少,导致数字化过程中缺少情感共鸣、忽视主体需求。要想破除工具理性对人文关怀的压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就要赋

予数字化教育以情感温度,强化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虚拟场域的交流互动,厚植数字化人文情怀。其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保持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适度张力,以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价值赋能数字技术。无论数字技术发展 to 何种程度,都不可能具有情绪情感,都不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发现数字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契合点,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沉浸式、体验式育人场景,以主流价值观浇灌数字技术,推动主流价值观的优先传播,防止错误思潮对教育对象的侵蚀。其二,要摆脱工具至上的教育场域,提升“有形”场域和“无形”场域的情感温度,深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精神层面以寻求情感共鸣。对于“有形”场域来说,教育者要善于将情感元素融入智慧教室等教学环境的设计当中,对于技术的介入要和教育对象进行交流,适度使用数字技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在场”;对于“无形”场域来说,无精神、无情怀的虚拟空间更需要情感的注入,教育者要以情动人,及时回复教育对象的线上咨询,舒缓教育对象的负面情绪,增强其在数字化教育中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以及及时有效的情感反馈提高其情感认同。

3.4 坚持理念驱动: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共识,提高主体数字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致使“媒介焦虑”现象愈演愈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化的进程。实际上,任何技术的应用都存在一定风险,必须树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数字化转型思维共识,提高其数字素养,降低潜在风险的危害。其一,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益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共识。数字技术提供的虚拟场域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空间,提供了育人新途径,教育者借助技术能够更好地把握教育对象的成长规律,通过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把握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投放,通过数据筛选能够精准匹配教育对象的现实需求,通过数据诊断能够精准评估教育对象的学习效果。但需要警惕“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陷阱,防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被工具化思维主导,落入唯科学论窠臼。其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数字素养,培养数字化人才。教育者要提升数字化育人能力,熟悉掌握数字技术的使用方法,善于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智慧化教学,通过网上录播课、线

上直播、在线答疑等途径强化育人效果,“让每个人在技术的帮助下,获得最大的自由,体现最大的价值,并从中得到幸福”^[8]。同时深刻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局限与风险,树立数据安全意识,避免产生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错误认知。教育对象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运用能力和信息辨别能力,熟悉掌握技术的使用方法,获取更加全面与精准的学习资源,要自觉抵制网络空间不良信息的误导和诱惑,避免在多源性、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失去甄别能力。

当前,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凭借其高效性、便捷性、智能性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逐渐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将数字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能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新形态,始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我们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理应警惕潜在风险,从技术本身、主体素养等方面探寻风险规避路径,以期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4.
- [3] 赵丽涛,于露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其优化路向[J].思想理论教育,2023(5):26-31.
- [4] 胡泳.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6.
- [5] 赵建波.思想政治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现实挑战及实践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3(3):85-90.
- [6] 李姿雨,方凤玲.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隐忧及其规避[J].思想教育研究,2023(3):52-57.
- [7] 薛永龙,吴学琴.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权力转移与价值引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4):95-102.
- [8] 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M].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290.